

一代伟人与百代文宗——毛泽东对韩愈的接受

查金萍

(合肥大学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毛泽东博古通今, 终生注重向前人学习, 韩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学生时代, 毛泽东对韩愈集熟研精修、烂熟于胸; 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对韩愈诗文信手拈来、点铁成金, 既融入到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的通道, 又展现出一代领袖的文采风流; 新中国建设时期, 在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下, 晚年毛泽东对韩愈的态度从“一分为二”向“扬柳抑韩”倾斜, 后来又回归“一分为二”。他的韩愈接受不仅为一代伟人的成长道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营养, 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 毛泽东; 韩愈; 一分为二; 转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4) 06-0128-08

收稿日期: 2024-09-25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AHSKZ2022D28); 民国皖人韩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 (2023KD008); 唐宋文人与安徽。

作者简介: 查金萍 (1978-), 女, 安徽太湖人, 合肥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6.011

无论在思想史还是在文学史上, 著名人物纵然相隔千年也总能跨越时空进行对话, 而且往往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思想史或文学史的进程。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开创者, 博古通今;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我们发现, 在毛泽东思想生发过程中, 韩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事实上, 近年来无论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还是研究韩愈的学者, 对毛泽东和韩愈的这种关联已有一定的关注。如, 陈晋和李锐在谈及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时, 无一例外都提及毛泽东对于韩文的研习, 并且认为在毛泽东后来的诗、词、文写作中, 韩愈的影响随处可见。^① 专文论及的有: 胡忠伟《毛泽东: 韩愈改变了我的文风》《毛泽东: 受韩愈影响改变了文风》、茅文婷《毛泽东读韩愈作品》、刘汉民《毛泽东与韩愈作品》、蔡清富《从昌黎处获益甚多——毛泽东与韩愈》, 或侧重毛泽东对韩愈的评判, 或侧重韩愈对毛泽东的影响。但是, 毛泽东从少年到老年, 对韩愈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自身知识的不断丰富、思想的逐渐成熟以及身份地位与时代环境的转变而有显著的变化, 厘清这一变化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和韩愈的这种关联性及其价值。令人遗憾的是, 既往研究没有触及到这点。本文试从毛泽东诗、词、文、书信、讲话 (谈话) 等文献出发, 探索一代伟人对一代文宗的接受历程及其接受原因与影响, 以期对毛泽东思想研究、韩愈接受研究有所推动与拓展, 并对当下如何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一定借鉴。

一、熟研熟读, 修学储能——读书求学时期毛泽东对韩愈文学的学习

1910 年早秋, 18 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 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求学之旅。这八年是毛泽东如饥似渴学习中西方历史、文化、哲学的时期, 为他后来军事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期间, 毛泽东持续研读韩愈诗文,^② 韩愈的诗文与思想可谓是毛泽东这一时期“修学储能”的重要资源。

《讲堂录》是毛泽东早年在湖南长沙四师和一师读书时的一本读书笔记。其“内容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 参见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万卷出版公司, 2015 年)、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等书。

^②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四师和一师读书时的读书笔记中有大量研读韩愈诗文的笔记。

一是古代一些名人的言论；二是古代的一些历史故事；三是历代文人学者的一些文学篇章；四是老师本人的著作或讲授；五是学生本人的发挥和议论。”^① 在这本笔记的后部分，有大量读韩愈诗文的笔记，约有九篇诗歌、赋及杂论，分别是：《鄂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盛德诗》《改葬服议》《谏臣论》（即《争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另外每篇韩文后评论部分还涉及到几篇韩文，如《上宰相书》《后十九日复上书》《后廿九日复上书》《答李翱书》等。^②

每篇诗文后面都留有毛泽东对韩愈诗文或详或略的注释、理解与点评，举凡引经据典，触类旁通，见解独到，可见毛泽东用力之勤和见解之深。^③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笔记仅存很少的一部分（1913年10月-12月），大部分内容都被他的族人付之一炬，^④ 我们今天无从得见。

据《西行漫记》中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可知，他之所以接触韩文、研修韩愈，与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仲谦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⑤

作为前清举人，袁仲谦受晚清文风影响且因举业需要，对韩愈与桐城派古文颇为推崇。他在湖南四师和一师国文课堂上倾心讲授韩文。但此时血气方刚的毛泽东并未对韩愈产生半点兴趣，而是沉迷于模仿梁启超的“新文体”中。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论及“新文体”的特色：“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⑥ 由于此体不同于晚清文坛的三种代表性旧体文——桐城派古文、选学派骈文以及科举八股文，故而在为读者激赏的同时，也被很多老派文人贬为“野狐禅”。袁仲谦即众多“老派文人”中的一员，他非常不满毛泽东这种文体风格，批评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但他非常看重毛泽东的才华，便力举他学韩愈，认为“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⑦。

为全面熟读韩愈诗文，毛泽东在长沙玉泉街的旧书铺买来一部宝庆（今邵阳）版的《韩昌黎诗文全集》，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部善本韩集（清代抄本）进行对比，对所购版本详加校勘，订正讹误。据湖南一师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⑧ 我们从《讲堂录》的一个细节即可看出这一点。毛泽东在研读《闵己赋》的笔记中，引用了宋代苏轼与司马光的文章对此篇进行注解，而所引两篇文章皆是对韩文思想的反驳与批判。宋人为何对韩愈此文持这种态度呢？《闵己赋》是韩愈早年在徐州张建封幕府时期所写的一篇较为短小的赋作，其主旨既是感叹儒道式微和生不遇时，也揭露了中唐社会精神没落的现状。但宋人认为其中所言“昔颜氏之庶几兮，在隐约而平宽。固哲人之细事兮，夫

①⑦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90页，第97页。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

③如《鄂州溪堂诗并序》后，毛泽东记道：“无我敦遗，敦，音亦，厌也。言无厌弃我也。”

④“马日事变”后为防反动派迫害，毛泽东的族人们将他存放韶山家中的书籍信札笔记等物搬在后山烧毁，他的幼年塾师毛宇居冒险留下了两册课本和94页九行直线本笔记（计万余字），包括手抄《离骚》《九歌》和七十多页《讲堂录》。（参见七律圣手卢志丹：《1913年12月13日毛泽东的课堂笔记，如何阐明“精细”决定成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8730520316683615&wfr=spider&for=pc>，2024年5月11日）

⑤“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員，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21页）

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⑧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红孩子》1959年第11期，第3-5页。

子乃嗟叹其贤。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有至圣而为之依归兮，又何不自得于艰难”^①，体现了韩愈对利禄的重视，对颜回圣贤精神的贬低，故而司马光《颜乐亭颂·序》曰：“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谄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②对于宋人的批判，毛泽东在笔记中引韩愈之言为其辩护：“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曰：孔子称颜子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簞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簞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③毛泽东赞同司马光与苏轼的观点，同时他也设身处地从韩愈当时的境遇出发，既是毛泽东与韩愈同为底层出身从而对韩愈的遭遇感同身受，也是对韩愈文章主旨的理解与宋人有所不同的表现，可见他研习韩愈，并非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几年潜心研读韩愈诗文之后，毛泽东已经能够熟练地写出思想和艺术兼美的古文，袁仲谦据此认为毛泽东将来定能承担挽国家于危难之大任。^④袁氏所言不虚，《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古文可以印证这一点：

客告予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蔓，缠牵成蔓，不能自伸。……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僭皇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枝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囂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于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匏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

予无以答，逡巡而退，浃然汗出，戚然气沮。^⑤

此文是1915年8月毛泽东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所抄录的一篇己作。文章采用主客问答式行文，通过粗野有实之匏瓜与娇艳无果之牡丹的对比，对自己的实学“牡丹之所为”而谎称“惟匏瓜之是取”进行深刻批评与反思，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义理沛然，字里行间与韩愈的《进学解》《送穷文》等篇颇有相似之处。如文章结尾用“逡巡而退，浃然汗出，戚然气沮”表明“我”的最后态度，这与《送穷文》的结尾“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⑥表明自己君子固穷的追求有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后来的毛泽东较少写文言文，但韩愈诗文中的字词、典故与思想一直影响着他，在他后来的诗、文、词中时而可见韩愈的影子。另外，韩愈文章“气盛言宜”的雄奇恣肆之风对毛泽东政论文的议论、气势与感情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早年对韩愈诗文的喜爱，除了袁仲谦的引领之外，也多少受乡贤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毛泽东童年时期有近八年在湘乡外婆家度过，16岁又在湘乡东山高校读书半载，对湘乡的这位声名赫赫的人物早有耳闻并心存敬佩。在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期的很多书信与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曾国藩的推重。《讲堂录》就多次提到曾国藩的著作，如在1913年11月29日笔记中有两条关于曾国藩的内容：

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⑦

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

①⑥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页，第572页。

②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六八。

③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12页，第592页。

④参见尹高朝编著：《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⑤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第82-83页。

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①

另外，在他早期给湘生、萧子升、黎锦熙等人的书信中都谈到他对曾氏修身、读书、治军等观点的认同与接受。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总结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②可见曾氏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的地位。曾国藩在文学方面以姚鼐为师，被后人誉为桐城派的“中兴之臣”。他诗文宗法韩愈，在《求阙斋读书录》《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经史百家杂钞》等书中对韩愈推崇备至。不难推断，毛泽东对韩文的喜爱也与这位乡贤的影响密不可分。

基于对韩愈诗文的学习，毛泽东对韩愈的认同和接受逐渐得到加强。毛泽东不仅深深体会到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为文之精深，培养和提升了自己的古文写作能力，更是从中充分体会到韩愈的雄豪自信与改革精神。从文学艺术到政治思想，毛泽东从韩愈那里汲取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韩愈文学的接受

早年的刻苦研修使毛泽东对韩愈诗文了如指掌，熟稔于胸，革命战争时期至建国初期作为革命家与理论家的毛泽东在诗、词、文中对韩愈诗文的引用可谓是信手拈来，左右逢源。为了革命需要，毛泽东从语言、内容、风格等多方面对韩愈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接受。

通观毛泽东诗词集、毛选与毛泽东文集，我们可以看到诸多对韩愈诗文的引用。这里的“引用”包括借用韩愈诗文语言与内容、化用韩愈诗文语句与典故以及反用韩愈诗文意思等。下文各举数例以明之。

首先看毛泽东文集中对韩愈语言与内容的借用：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韩愈《符读书城南》），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过去韩文公《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③

这段话出自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在这篇讲话稿中，他两次借用了韩愈的诗文来说明道理。

在《毛选》五卷本中，毛泽东借用韩文成语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有学者统计：《毛选》的多篇文章从韩愈《应科目与时人书》《平淮西碑》《柳子厚墓志铭》《进学解》等约12篇文章中引用的成语多达17条。^④

再来看毛泽东诗词中对韩愈诗文的化用：

1.《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红烂漫”出自韩愈《山石》“山红涧碧纷烂漫”，用经霜的红枫林比喻生机勃勃的革命根据地。^⑤

2.《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七字并举源自韩愈《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鸱鸢雕鹰雉鹄鸱”句。^⑥

3.《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化用韩愈《咏雪赠张籍》“岸类长蛇搅，陵犹巨象脰”。毛诗形容陕西和山西一带的高原上覆盖着白雪高低起伏的丘陵，像白色的大象在奔跑。^⑦

4.《送瘟神》其二：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唐代的韩愈《送穷文》写他准备了焚化用的车和船来送穷鬼。这里是借来形容瘟神在六亿人民奋

①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3页，第85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181页。

④如“视若无睹”“大声疾呼”“交口称誉”“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袖手旁观”“杂乱无章”“行成于思”等，参见刘汉民：《毛泽东与韩愈作品》，《党史文汇》1998年第3期，第14页。

⑤⑥⑦徐四海编著：《毛泽东诗词全集》，上海：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129-132页，第146-147页，第185-194页。

进中无处存身，只有逃离人间。^①

5.《七律·登庐山》：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化用韩愈《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毛诗是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向长江上游望去，云彩在空中不断变换，仿佛有黄鹤在飞翔。^②

6.《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化用韩愈《调张籍》：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毛诗此指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企图指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上其他马列主义政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③

7.《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罗章龙《椿园载记》注云：“‘云开衡岳’句，见唐代韩愈《岳庙》诗。”韩愈《岳庙》诗即《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是韩愈由湖南郴州往湖北江陵任所，途中游衡山所作。诗中有“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之句。^④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毛泽东擅长活学活用，化用韩愈诗文来表达现实革命的需要与情感的需要，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将韩愈的诗文词句化为自己的新语言、新内容与新主旨。真正做到了将古人语言中有生命力的东西充分合理地加以利用。

与早年研读韩愈的态度一致的是，毛泽东不仅正面接受韩愈，而且也经常带着批评眼光来审视韩文，特别是其经过革命战争的锤炼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渐成熟之后，他能更加全面而科学地对待韩愈诗文了。他认为韩愈诗文固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写法或思想方面的诸多不足，因而其文集中也留下了很多反用韩文的例子。

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⑤韩愈《与崔群书》曰：“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⑥毛泽东读后写了一条批语：“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⑦以上两例，第一例将韩愈对伯夷的颂扬变为批判，第二例认为韩愈以偏概全，都体现了毛泽东对封建正统观念的颠覆，同时也证明了他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视角来接受韩愈的，表明了他在新时代的新思想、新立场。

在1959年4月15日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话：“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尽量讲，他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⑧以韩愈的诗作为反面教材来提醒与会人员做工作一定要留有余地。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道：“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基本上也是古人的。”^⑨希望哲学工作者们不要学韩愈，要做有创新的研究，写出有自己理论观点的文章。

这两例谈的都是韩诗与韩文写作上的缺点，但毛泽东并非就写作谈写作，而是以此来达到为实际工作提供警示的目的。

除了语言、内容、风格与写作方法的接受，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毛泽东对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⑩的接

①②③④徐四海编著：《毛泽东诗词全集》，上海：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249-258页，第265-269页。一说“黄鹤”指武汉黄鹤楼，第313-317页，第371-373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5-1496页。

⑥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88页。

⑦⑧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第87页，第85-86页。

⑨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小组：《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1月25日，第561页。

⑩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13页。

受。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接受了桐城派文以载道的理论^①，此论甚确，但我们必须承认，桐城派文以载道理论源自韩愈的文以明道^②。可以这么说：韩愈文以明道的思想，通过韩愈诗文以及桐城派的宣扬最终影响了毛泽东，这对我们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至关重要^③。

三、扬柳抑韩，一分为二——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对韩愈文学的批评

随着知识面愈来愈宽广，革命斗争经验与人生的阅历愈来愈丰富，思想愈来愈成熟，毛泽东对韩愈的接受也慢慢从早期的顶礼膜拜变为严格审视，在建国后这种“一分为二”的观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上文叙述即可可见一斑。而到晚年，由于新中国全面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对韩愈的“一分为二”开始变得偏向批判，特别是经常将韩愈与唐代另一位古文大家柳宗元相比，表现出明显的“扬柳抑韩”的特色。

1964年，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辞’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老，唯物主义。”^④

这段话中他将韩愈的排佛老与柳宗元的出入佛老进行对比，表现了对韩愈的不满，认为他对待佛老的态度是唯心主义，而柳宗元是唯物主义。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当时正在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毛泽东在谈及韩愈时指示道：“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谏迎佛骨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数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原道》也是如此。”^⑤毛泽东认为韩愈的排佛止于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来禁佛，而没有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论述，从而显示了韩愈思想的局限性。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就章士钊《柳文指要》一书写信给康生：“（《柳文指要》）颇有新义引人入胜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⑥《柳文指要》是章士钊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的一部研柳专著。此书对柳宗元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了全面研究，高度肯定了柳宗元的进步性。在与韩愈的比较中，大力褒扬柳宗元“以民为主”的思想，而竭力批判韩愈“以民为仇”的错误观念，被毛泽东誉为是“解柳全书”。这本书扬柳抑韩的倾向深合毛泽东心意，后来在毛泽东的大力促成下，终于在1971年9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回忆，1975年她在中南海给毛泽东讲读中国古典诗词期间，毛泽东跟她的很多谈话，都表明了晚年毛泽东对韩愈“道”的批评以及扬韩抑柳的一面。1975年6月，她给毛泽东读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当读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时，毛泽东说：“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那时两个字，叫‘文昌’。”^⑦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高度赞扬了韩愈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对此提出质疑，并完全否定了苏轼的结论，这种评价正是毛泽东否定儒家道统，肯定思想解放与建立新文化立场的体现。

①王达敏：《毛泽东与桐城派》，《安徽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64-70页。

②郭绍虞有“明道派”“贯道派”“载道派”之分，莫砺锋《“文以载道”价值的重估——以杜甫为例》一文认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表述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接近，故学界很多学者皆以“文以载道”来统称这一论题。

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④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小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61页。

⑤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03页。

⑦芦荻：《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党史文汇》2006年第11期，第52-53页。

在与芦荻讨论古文的过程中,毛泽东明显偏爱柳宗元:“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柳文的光辉。相对说来,毛主席对于韩愈的评价差一些。他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①

通过上面这些论述,我们大概可知晚年毛泽东对韩愈的基本态度。他的扬柳抑韩主要出于一位新中国政治领袖对唯物与唯心、儒家与法家的取舍以及阶级斗争中对人民态度的判定。

1954年,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研究》第二期发表了《论韩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从六个方面高度肯定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认为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人物”^②。这篇文章主张坚持学术自由,甚至有反对当时全国学术界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倾向。此文引发了学术界对于韩愈评价的讨论。黄云眉、任访秋、邓潭州、杨荣国等学者纷纷撰文对韩愈诗文及思想、人品等进行探讨。^③学术界的动向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58年6月4日他给秘书林克留言说:“请将《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买一部给我。”^④因为这辑上刊有邓潭州《论韩愈的诗》。学术界对韩愈的评价有肯定,也有否定,这些观点也让当时的毛泽东更深入地思考对韩愈接受的问题。

从毛泽东晚年批评韩愈的真实情况来看,他对韩愈的接受以批判为主,但并未一棍子打死,在很多场合,他对韩愈诗文的优点还是予以肯定的。他对韩愈的态度已从“扬柳抑韩”向“一分为二”回归。1965年7月21日,他给陈毅的信中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⑤可见毛泽东对当时学术界部分学者完全否定韩诗作法是不赞成的。

四、毛泽东对韩愈接受的影响与启示

毛泽东一生最关注、最熟悉的古人中,韩愈无疑是重要的一位。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韩愈的接受有所变化,但对韩愈的研读一直未曾终止。即便到了政务繁忙、精力有限的晚年,他也依然时常翻阅韩文,勤作批语,结合时境记载自己的所思所得。1965年8月,他让人找来《韩昌黎全集》,对其中《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遂宿岳寺题门楼》《石鼓歌》《听颖师弹琴》等十二首诗歌进行圈阅,并手书韩诗三首。^⑥他曾经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建议语文课本选入唐宋八大家的作品,^⑦并在他80岁高龄之际,还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并印制大字本的《石鼓歌》,以便阅读。除此之外,姚鼐《古文辞类纂》也是毛泽东晚年多次借阅的书籍,而此书选有大量韩文,毛泽东在阅读其中一些篇章后还写有批语,如上文提到的《与崔群书》即是一例。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韩愈诗文终生的兴趣及其取向的变化,必然会因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在韩愈接受史上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毛泽东诗、词、文中大量引用韩愈诗文,是对韩愈诗文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韩愈文学在现代的传播功不可没。很多读者通过毛泽东作品了解了韩愈诗文中的成语、典故以及韩愈的文学成就。

另一方面,晚年毛泽东对韩愈的评价回归为一分为二。1975年8月,正在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刘大杰为韩愈的评价犯愁而上书毛泽东:“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却存在着矛盾。其诸多作品,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于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关于这些,如果全部加以否定,

① 吴冬平:《活到老,学到老——毛主席晚年如何学习》,《新湘评论》2011年第9期。

②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③ 黄云眉:《读陈寅恪论韩愈》(《文史哲》1955年第8期)、《韩愈的文学评价》(上)(下)(《文史哲》1956年第11、12期)、任访秋《论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新建设》1957年第9期)、邓潭州《论韩愈及有关几个问题——与黄云眉、任访秋两先生商榷》(《人文杂志》1958年第3期)、杨荣国《韩愈思想批判》(上)(下)(《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1、12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七册,第257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⑥ 参见蔡清富:《从昌黎处获益甚多——毛泽东与韩愈》,《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48页。

似非所宜。”^①半年后，即1976年2月毛泽东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②毛泽东对韩愈“一分为二”态度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让韩愈研究倍受关注。据不完全统计，1977-1979两年间，韩愈论文多达64篇，比1954-1976这22年的总量还多出12篇。

综而观之，毛泽东对韩愈的接受与批评，不仅让我们看到一代伟人对传统优秀资源的汲取，也让我们充分领受到历史巨人对文学传播的重要影响，这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当代，对我们思考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启示：

其一，韩愈思想与诗文对毛泽东具有滋养、启发之功。作为一代伟人，其知识结构必然是全面而广博的，除了应具备政治、军事、经济的相关理论知识之外，文学、史学、哲学理论与知识亦是不可或缺的一块。毛泽东是一位十分重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与文学的政治领袖，他一生寝馈其中，乐此不疲，阅读并批点了大量古籍，其中包括韩愈的全部诗文。他对韩愈的接受，一方面滋养了他的文学创作：让他的诗词大气磅礴，让他的散文雄豪壮观；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对儒家思想、文学与政治革新，甚至对辩证法的思考。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那么韩学应该是传统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分。

其二，考察韩愈接受史，我们发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对韩愈的接受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清代康乾时期是如此，新中国建国初期亦是如此；而当一种新的政治形态与哲学思潮兴起之时，必然会使学术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和接受韩愈，但有一些基本的态度与方法必须一以贯之，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了解之同情”。任何一个时代，既要立足于时代大背景，亦要坚持学术本位，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对韩愈做出公正、严谨的评价。

其三，对待包括韩愈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客观、科学、敬畏的态度一分为二地予以评价，大力弘扬其精华，坚决摒弃其糟粕。对于古人，我们既不能全盘肯定、片面夸大，亦不能全部推翻、一味贬损。我们应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③。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学术研究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Mao Zedong and Han Yu

ZHA Jin-ping

(School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Media,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ancients Mao Zedong studied in his life, Han Yu was a very important one. Mao Zedong in his school-days was proficient in research and refinement of Han Yu's articles and proficient in chest. Mao Zedong in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 had Han Yu's poems and articles at his fingertips and ordered iron into gold. It not only met the needs of revolution, but also expressed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revolutionist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his later years, Mao Zedong's attitude towards Han Yu was inclined from "splitting into two" to "raising Liu and restraining Han". Later, it returned to "splitting into two". His acceptance of Han Yu not only provides a generation of great people with indispensable cultural nourishment on their growth path, but also ha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to our academic research and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al culture today.

Key words: Mao Zedong; Han Yu; splitting into two;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责任编辑 唐音]

①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第86页。

②《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27页。